

# 「重起鑪竈」：民族危機與顧頡剛學術思想的轉變\*

陳學然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 前言

錢穆(1895–1990)於其八十高齡撰成的回憶錄裏，記載了不少他與顧頡剛(1893–1980)交往的點滴。就在古史辨運動大行其道的二十年代中後期，寂寂無聞的錢穆被顧頡剛引為同志，以中學教員的資歷獲顧頡剛推薦進燕京大學任教。對於顧頡剛的知遇之恩，錢穆可謂一生念茲在茲。錢穆嘗自稱與顧頡剛在「疑古」、「考古」的學術事業上，彼此「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sup>1</sup>他更有藉《劉向歆父子年譜》「為顧先生助攻那西漢今文學家的一道防線，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展進一程」的心願。<sup>2</sup>他也一再以「相當的贊同」的態度，公開張揚古史辨運動。錢穆闡揚古史辨運動的指歸與興起經過的文字，不少直接引述自這一運動的精神領袖胡適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sup>3</sup>

然而，錢穆與顧頡剛的學術思想歷程畢竟有異。錢穆在三十年代初期便因為目睹日軍侵華而國運凌夷的緣故，感覺到疑古辨偽對國史國運將會造成消極影響，故轉而主張「重光國史」、「轉步國運」和喚發「民族文化演進之真態」，強調維護古史價值的重要意義。<sup>4</sup>基於這種思想價值取向，他自然難以再像古史辨運動初興之日般感

---

\* 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資助項目「顧頡剛與現代中國的學術轉型」(GRF Project no. 140213)的部份研究成果，謹向該局致謝。論文初稿獲得三位匿名評審先生十分詳細和富啟發性的修改建議，謹此誠致謝忱！

<sup>1</sup>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171。

<sup>2</sup> 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載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頁61。

<sup>3</sup> 錢穆：〈最近期之學術思想〉，載錢穆：《國學概論》(香港：國學出版社，1966年)，頁149–51；另見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頁48–49。

<sup>4</sup> 錢穆：〈序〉，載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046–52。

到與顧頡剛精神意氣相投。但錢穆對顧頡剛的學術事業始終是有褒無貶的，因而維護顧頡剛其人其學之情不時流露筆端。相對而言，錢穆身邊一些包括港臺新儒家在內的南下文化保守主義者，不少是批評顧頡剛疑古史學的。譬如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同事唐君毅（1909–1978），雖然與顧頡剛在重慶中央大學共事時多有過從，<sup>5</sup>但彼此的思想分歧始終難以彌合，卻是事實，唐氏也毫不忌諱地把他不滿顧頡剛的疑古史觀寫於文中。<sup>6</sup>雖然在四十年代前後，顧頡剛已在日記裏對錢穆作嚴厲的人格批評；但錢穆在晚年趨向否定古史辨和嚴厲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際，<sup>7</sup>於大量回憶文章和雜文中，卻又很少批評顧頡剛其人其學。對於有恩於己的學界伯樂，他倒發現顧氏其實在三十年代便已放棄了疑古辨偽的學術工作。錢穆晚年頗有站在自己的學術文化立場上轉引顧頡剛為同調的意味，曾不止一次指出顧頡剛思想前後發生了變化，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句話：「對其早負盛譽之古史辨書中所提問題，則絕未聞其再一提及。余窺其晨夕劬勤，實有另闢蹊徑，重起爐竈之用心。」<sup>8</sup>不過，錢穆並沒有詳細指出顧頡剛另起甚麼「爐竈」，也沒有說他是在甚麼樣的學術背景和心情下另闢「蹊徑」，這些地方錢穆的追述都少有觸及。<sup>9</sup>從顧頡剛當時的學術工作不難看到他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間所窮心究力的領域，除了最為主要的疑古辨偽外，前有歌謠研究、民俗研究，後有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邊疆考察和民族史研究，後者更跨至1949年前的一段時間。但我們可以說，他前後學術思想的一個不可忽略的要旨，就是把學術當作應時救國的工具。他自以為求真求用的學術其實處處受制於他致用求

<sup>5</sup> 有關顧唐二氏的交誼，可見《顧頡剛日記》卷四、五、六。顧頡剛1948年6月1日的日記記述了唐君毅對錢穆的批評和唐氏對顧頡剛本人的稱讚。據說唐氏對人批評錢「脾氣古怪，真有不可與同群之感」，轉而讚揚顧頡剛「氣魄大」。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六，頁292。本文徵引顧頡剛著作，除《顧頡剛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外，均據《顧頡剛全集》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sup>6</sup> 顧頡剛的史學於唐氏眼中並無正面的具體的成果，只是以消極的懷疑態度批判傳統文化。見唐君毅：〈百年來中國民族之政治意識發展之理則〉，載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唐君毅全集》第6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167。

<sup>7</sup> 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錢穆是以全盤否定的態度看待的。見陳學然：〈道統庚續與五四批判：錢穆學思管窺〉，載黃兆強（主編）：《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2010年），頁181–210。

<sup>8</sup>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250。

<sup>9</sup> 較早探討顧頡剛學術思想的轉變、且引述錢穆「另闢蹊徑，重起爐竈」一語為佐證的，有廖名春的〈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一文。廖文引用錢穆此語，目的在於說明顧頡剛在抗戰形勢下「對自己早年勇於疑古的反省」，進而有「這也可能包含有對自己早年接受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的自責」的假設性推論。說顧頡剛因「反省」和「自責」而有思想上的轉變，錢穆之言倒過來主要被當作是坐實顧頡剛古史辨抄襲論的佐證。見廖名春：〈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載陳其泰、張京華（主編）：《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1949–2000）》（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頁253–69。

用的目標。不論是疑古辨偽以求打破傳統、另立新學風，還是考究邊地以證成「中華民族是一個」的，都有他十分清晰的因時而變的目標。顧頡剛處身在由傳統進入現代的過渡期，他出現的精神焦慮和治學思想及形式上的諸種或斷或續，情況錯綜複雜，值得深入研究。

在北伐至抗日這段時期裏，顧頡剛的思想有甚麼樣的變遷和發展，目前學界的深刻研究仍不算太多。<sup>10</sup>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有葛兆光新著的相關論述(詳下文)，他注意到顧頡剛在抗日期間發表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論調，正好一反其自身於疑古辨偽時期主張的民族多元論，說明顧頡剛在抗日救國的危機意識下，即使是啟蒙的思想也要讓路於救亡的時代呼聲。換言之，從錢穆到葛兆光，其實都說明了顧頡剛的思想發展在三十年代經歷了一次大轉變。在這裏，我們更不可忽略的還有余英時關於顧頡剛學術思想發展的論述。余英時在那篇廣為學術界注意和引用的《顧頡剛日記·序言》(臺灣聯經出版社版)裏，雖然沒有特別針對顧頡剛的思想轉變問題，但點出了顧頡剛如何受他所愛慕的北大女生譚慕愚(1902-1997)影響而發生學術事業的轉型。

要之，我們不難從諸家論述中看到影響顧頡剛思想轉變的人與事，瞭解他在不同時期的思想發展趨向。目前的研究雖能說明顧頡剛的思想轉變，但同時也不免使其思想變得不完整和不連貫。於本文而言，顧頡剛思想的前後轉變是一種連續且有內在聯繫的發展，實需要連接其思想發展的整體脈絡和複雜心理個性而作全面的觀察。更重要的是，種種所謂「轉變」都只是其人治學形式和方向於不同階段的發展，而主導着學術思想發展的是他亟亟於應時致用和不落一端的「流變」史觀，致使他創造了一個異於時人的學術天地，同時也折射出他本人複雜而敏感的思想個性。

### 引領學風：疑古辨史、打破傳統

1923年5月6日，顧頡剛在《讀書雜誌》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造成的古史觀」，把他自言「植根於姚際恒、康有為、夏曾佑之書；其後又受崔述、崔適、朱熹、閻若璩諸人之啟發」的疑古思想，<sup>11</sup>有系統地宣之於世：

<sup>10</sup> 近年涉及顧頡剛如何在抗日救國大變局下從「求真」走向「致用」，從疑古、考據走向民族考察和建立救國學術事業的研究，主要見諸劉俐娜：〈抗日戰爭時期顧頡剛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3期，頁11-17；劉龍心：〈通俗讀物編刊社與戰時歷史書寫(1933-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期(2009年6月)，頁87-136；周勵恒：〈西北民族考察與顧頡剛的學術研究〉，《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頁103-12、126；何卓恩、李周峰：〈「求真」與「致用」——「九一八」事變前後顧頡剛的學術心路〉，《甘肅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頁62-65。

<sup>11</sup> 顧頡剛：〈疑古思想由於封建勢力之下降而產生〉，載《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九，頁206-7。

# A New Beginning: National Crises and Gu Jiegang's Intellectual Changes

(Abstract)

Chan Hok Yin

A leader of the Doubting Antiquity Movement of the 1920s, Gu Jiegang (1893–1980) was well known for his cultural iconoclasm. But in the 1930s, he experienced a drastic change in his intellectual life. Partly in response to Japanese expansion in Manchuria and northern China, Gu no longer practised “learning for the sake of learning.” Instead, he used his academic writings to mobilize his fellow countrymen to defend their nation. As a result, he changed both the purpose and the content of his academic writings. Unlike his previous works which challenged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he affirmed the Chinese tradition. Rather than exposing the hypocrisy of national memory, he participated in creating a collective memory for national resistan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amines these changes in Gu's thoughts and links them to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關鍵詞：** 顧頡剛 中華民族 史學思想 民族危機 抗日救國

**Keywords:** Gu Jiegang China nation historiography national crisis national resistance